

傳播學在美國的發展： 從SCA易名為NCA談起

馬成龍 *

壹、緒言

1998年7月1日下午，海內外十五位傳播學者齊聚政大附近貓空美加茶園，討論傳播溝通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窗外雷電交加，然而絲毫不影響與會者的熱烈發言。討論主題有下列四項：

1. 從美國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易名為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談歐美「口語傳播」領域之改變與發展。
2. 「口語傳播」在台灣若欲成為一個獨立的學門，前瞻性之研究方向為何？
3. 「口語傳播」在台灣若欲成為一個獨立的學門，大學部課程應該如何規劃？
4. 針對「口語傳播」科系畢業生的就業問題，討論「口語傳播」與各行各業的相關程度。

作者在會中所談針對傳播歷史的部份，整理出來在此作較完整的報告：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全球最大規模的傳播學會（會員超過七千）於1997年以近七成選票的支持，將名稱從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SCA）改為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NCA）（"Membership changes name," 1997），實其來有自。事實上，自1914年成立以來，這學會在美國共易名四次：

1914年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c Teachers of Public Speaking成立；

1923年易名為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Speech；

1946年易名為Speech Association of America；

* 馬成龍為紐約州立大學Fredonia校區傳播系副教授。E-mail: ma@ait.fredonia.edu

1970年易名為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Bochner & Eisenberg, 1985)；最後於1997年易名為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現在來回顧一下這個學術領域的歷史背景及發展過程，進而從中探討NCA易名的原因及意義。

貳、歷史背景

這學科可追溯到古希臘的rhetoric (Benson, 1985, p. vii)。Rhetoric很難翻譯成一個特定的中文詞句。用在口頭表達時，翻成「辭辯學」或「說話技巧」較為恰當；用在寫作時，則翻成「修辭學」或「寫作技巧」較為妥切，但用在聲光效果時，如"rhetoric of vision and sound"，又指「為達成特定效果所作的設計」。廣義來說，"rhetoric"就是「為產生特定效果所作的訊息規劃設計 (goal-oriented message sending device)」，亦是傳播溝通的本質。由於無單一對等語詞，作者在本文中將儘量使用 "rhetoric"。古希臘有關rhetoric的著述，最有名的當推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 的《Rhetoric》一書。此書像是一本演說教科書，教我們如何在不同的情況，運用不同的說服技巧，例如如何把結構推理 (logos)，個人信譽 (ethos)，及感情訴求 (pathos) 巧妙地融合在我們的說服演說中，以及分析如何把演譯三段論 (syllogism) 以簡化的形式 (enthymeme) 使用在口頭表達上。古羅馬的希塞羅 (Cicero; 106-43 B.C.) 及昆提連 (Quintilian; 35-100 A.D.) 亦是古典rhetoric的代表人物。他們將亞里斯多德的rhetoric發揚光大。希塞羅提到的演說五大要素 (five canons of speech)：invention (構思)、arrangement (組織)、style (語言風格)、memory (記憶)、delivery (口頭表達) 至今仍是美國演說教學中的重要觀念。

中世紀 (大約是500-1500 A.D.) 及文藝復興時期 (大約是1400-1600 A.D.)，根源於古希臘羅馬的古典rhetoric，特別是希塞羅的寫作，仍頗為盛行 (Golden, Berquist & Coleman, 1992: 70-71)。但rhetoric研究已漸從原先的演說技巧擴展到文法、詩詞、寫作、教會證道及邏輯各方面 (Golden et al., 1992: 70)。

隨著印刷術的發展，政治及商業事務愈發借重書面文字，口頭辭辯的研究也慢慢轉為寫作修辭的研究 (Golden et al., 1992: 83)（因此，今日 "rhetoric" 在很多字典上的唯一解釋是「寫作修辭」）。到十七世紀初期，由於受到科學、哲學、和心理學各種新知識的衝擊，rhetoric在英國及歐洲大陸的發展，形成下面四種趨勢：

- (1) 在寫作中發揚古典rhetoric的「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
- (2) 將rhetoric與詩詞、戲劇、哲學寫作批評結合在一起的「純文學派」(Belles Lettres)；
- (3) 從人的自然本性探討表達行為的「心理認知學派」(the psychological-epistemological school)；
- (4) 強調五大要素中的口頭表達(delivery)技巧的「演講術」派(the elocutionists) (Golden, et al., 1992: 83-169)。

這些學派後來都在新大陸登陸，但對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 早期發展影響最大的是「演講術」派。這一派思潮承襲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Ramus對rhetoric與哲學的區分闡釋。他認為希塞羅五大要素中的invention和arrangement屬於邏輯學的研究範疇，rhetoric應祇限定在style和delivery兩要素上，亦即專注在語言風格和口頭表達上 (Howell, 1951)。「演講術」派介紹了很多演講中語調及肢體控制的技巧。當然，以後人的眼光看來，這些理論是有問題的，因為不同的文化會發展出自己認為最好的表達方式。

這些教授演講術的人在美國曾一度很受歡迎。他們在1892年組織了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locutionists，爾後在1906年改為較廣義的National Speech Arts Association，但於1917年停止運作 (Rarig & Greaves, 1954: 490)。「演講術」派沒落的主因，是其組成份子良莠不齊，許多學藝不精的表演藝人摻雜其中，使社會漸對其產生負面印象 (Rarig & Greaves, 1954: 491)。「演講術」派亦曾一度在美國主要大學走紅，後終因缺乏深厚理論基礎而被逐出校園 (Infante, Rancer & Womack, 1997: 516)。二十世紀初，學術界開始意識到「演講術」派傳授的祇是些空洞無本質的「化裝技巧」 (Leff & Procaro, 1985: 4)，校園內師生希望把口頭表達藝術當做學術來探討，而不是當成江湖技藝來學習 (Rarig & Greaves, 1954: 491)。

參、學會的誕生與發展

「演講術」派漸趨沒落的同時，美國一些在英文系擔任演講(public speaking)課程的教師覺得，與現實生活密切結合的演講教材和英文教師所講授的文學課程差異甚大，卻被放在英文系以相同的學術標準審核，頗不公平 (Rarig & Greaves, 1954: 497)，遂於1914年脫離了全國英文教師學會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自組演講教師學會 (Association for Academic Teachers of Public Speak-

ing），此會即NCA的前身。他們在學會名稱上特別冠上"Academic"以與非學術性的 elocutionists劃清界限（Leff & Procario, 1985: 4; Rarig & Greaves, 1954: 499）。翌年，該會發行的第一本學術刊物Quarterly Journal of Public Speaking問世。該季刊於1918年改名為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Education，又於1928年學會改稱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Speech之後易名為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Matlon & Ortiz, 1997: 352）。該刊至今仍以報導rhetoric方面的研究為主，也是NCA最老的期刊。

這個學會從一開始就有本身定位的問題。為了要擺脫「演講術」派的陰影，當Association for Academic Teachers of Public Speaking成立時，特別強調要對演講作「科學化」的研究，然而多數演講教師不作研究，也不懂什麼叫科學研究。他們所用教材紊亂，沒人知道什麼該教，什麼不該教。雖然演講教學起源於古希臘羅馬的rhetoric，但當時rhetoric早已被定位成是屬於文學及文學批評方面的課程。到1920年代中期才有人試圖將rhetoric與英文寫作分家，1930年代開始，rhetoric方面的古典文獻才被視為是這個領域的基石。由於缺乏教材，演講學者開始從心理學引進理論，一者，心理學的研究比較「科學化」；再者，心理學中不少研究，如聽眾行為的心理研究，與口語表達密切相關（Bochner & Eisenberg, 1985: 304-306）。漸漸地，這領域就產生了人文與科學之爭，或是rhetoric與communication之爭。1934年該學會第二種學術期刊，Speech Monographs問世。之所以另起爐灶，主要原因是愈來愈多的研究報告讓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的有限篇幅無福消受，但同時，Speech Monographs誕生後，開始刊載實驗方法的研究（experimental study）（Rarig & Greaves, 1954: 506），這也象徵科學與人文分庭抗禮的時代來臨了。此期刊於1976年易名Communication Monographs（Matlon & Ortiz, 1997: 69），至今仍以刊載量化實證研究為主。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Speech於1946年易名為Speech Association of America（SAA）。後又於1970年易名為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在漫長的幾十年裡，這個學術領域發生了許多變化。但這些變化不是突然發生的，同樣的變化也並非同時在不同的校園發生。在此由於篇幅有限，不克一一著墨，僅以宏觀角度，大略敘述如后。

自演講教師學會於1914年成立以後，許多人認為膚淺的演講教學不可能成為一個學術領域，因此必須更寬廣地解釋這門學科。於是學會在1917年通過決議：建議將原先五花八門的系名，如public speaking, oratory, oral culture, science and art of

expression, oral English，統一正名為"speech"，因為使用"speech"不但隱含較高層次的才智運用，也可使教學內容超越演講臺的層級（Bochner & Eisenberg, 1985: 306-307）。結果speech慢慢成為一個舉凡與用嘴有關，從人文到科學無所不包的學術領域。除了演說和辯論外，語言學（philology），語言矯正（speech correction），戲劇（theater），口述文學（the oral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廣播電視及電影（radio, TV and film）等科目，均可在speech系裡找到（Delia, 1987: 78）。事實上，此類speech系不應翻譯成中文的「演講系」，而應稱為「表達藝術（expressive arts）系」。它一直到1980年代還普遍存在。但在1990年代，隨著communication或communication studies系的普遍成立，已很難在美國大學校園找到這種什錦的speech系了。

語言矯正（speech correction）教師以語言障礙為研究目標，不同於以研究正常人表達為目標的speech communication，他們在1926年組成了自己的American Academy of Speech Correction（Rarig & Greaves, 1954: 508）。後來，在融入現代醫學知識後演變成的語言病理（speech pathology）與speech communication距離更遠。戲劇雖與表達藝術有關，惟扮演莎翁劇中角色畢竟與演講辯論時發抒己見相去甚遠。1931年一些戲劇教育者由於不滿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Speech年會中的戲劇專業層次太低，而自己成立了National Theatre Conference，並於1936年演變成National Educational Theatre Association（Halstead & Behringer, 1954: 642）。獨立於speech之外的語言矯正系及戲劇系，分別於1950及1960年代開始在美國大學相繼成立（Delia, 1987: 78），不過至今仍能找到將speech communication與語言病理或戲劇課程放在同一系上的學校。而NCA組織內也還有一個Theatre Division。此外，受到社會科學傳播觀念發展的影響，廣播電視開始與原本以寫作為主但漸具大眾傳播宏觀的新聞學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大眾傳播系」或「大眾傳播與新聞系」。

肆、從Speech到Communication

社會科學在傳播觀念上的發展，給原先偏重表達藝術的speech領域注入了新血。一方面，它提供了新的傳播觀念及實驗研究方法，例如波樓（Berlo, 1960）提出除言語外，人類常透過各種感官接收訊息，Hovland、Janis及Kelley（1953）以科學方法實證產生說服效果的各種因素；另一方面，融入社會科學知識後發展出來的新rhetoric理論，也逐漸取代了傳統的rhetoric觀點，例如Burke的「rhetoric即認同」理

論 (Burke, 1969) 及「戲劇性」(dramatism) 分析法 (Burke, 1945) 都融入了許多社會心理學觀念，與古典rhetoric的偏重言辭辯駁大異其趣。新的傳播辭彙也慢慢取代了老的、較不精確的語詞 (Delia, 1987: 82)，例如使用「訊息發送者」代替「說話者」以確實表達發送訊息時的多管道現象。不過傳統speech研究與新傳播觀念最大的差異乃是「傳播」(包括演講) 在新觀念中被認為是一個雙方互動的「過程」(process)，而非單向說服 (Delia, 1987: 82)。這「過程」觀念，是Speech Association of America (SAA) 改名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 前夕會員對未來理論研究方向所作討論的中心議題，最後在名稱上以"speech communication"取代"speech"，可說是傳統speech與新進傳播觀念妥協下的產物 (Delia, 1987: 83)。也就是說，當speech學者從強調「訊息製作」和「發送訊息者技巧」的傳播觀念 ("message-centered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and "speaker-centered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演進到強調「發收訊息雙方意義匹配」的傳播觀念 ("meaning-centered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Barnlund, 1962) 之際，亦是SAA易名SCA之時。

雖然從speech走上speech communication是大勢所趨，但在這個領域內部，為了到底該走rhetoric亦或communication路線始終爭吵不休。這場傳統rhetoric學者的陣地保衛戰曾被形容為人文與科學之爭或傳統學術與實證研究之戰。傳統人文研究指的是rhetoric，而實證科學則是communication (Bochner & Eisenberg, 1985: 316)。至今，仍有少數學校speech與communication隸屬不同科系分庭抗禮，例如夏威夷大學的Manoa校區。不過，在多數學校，rhetoric課程都被融入在極具包容性的speech communication課程內，而系裡通常還提供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mall group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等其它課程。在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內的結構也反映這種趨勢，"rhetoric"的名稱僅見於Rhetorical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Division，而該division只是眾多division中的一個。Rhetoric漸漸被當成communication研究方法中的一種，而非與communication對抗的另一領域。舉例來說，rhetoric分析批判方法會被用在公共關係、組織傳播以及文化間傳播的研究上。

Rhetoric與communication的爭吵漸漸緩和後，社會科學中「量化」與「質化」研究方法（即中國大陸所稱的「定量」與「定性」分析）的爭議，也在1980年代浮出檯面。先是1970年代中期以後興起一股行為科學量化研究熱。量化研究固然可用在描述性研究、解釋性研究、及預測性研究，而最大長處則是在預測性研究中能找出傳播

現象的因果關係，以預測未來，解決問題。但這種預測性是基於一個大前提：即人的傳播行為會規則地受外在環境左右（所以研究人員可以取樣觀察並作出通論）。後來這個前提受到很多學者質疑，他們認為任何一個傳播過程都是在特定時空與情境架構下的產物，無法複製，更遑論取樣本作出通論。人的意志，事物對傳播者的特殊意義，甚至所謂的「天人交戰」過程，才是影響傳播行為的根本原因，所以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質化」研究大量出爐。目前，專攻speech communication或communication studies的博士班研究生幾乎都必修「量化」及「質化」兩種研究方法。在許多學校，連rhetorical criticism也是必修的研究方法。

與communication相關領域的整合，在Speech Association of America易名為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之後次第展開。原來的speech系與新聞系均由於吸收了傳播研究而對本身加以調整（Delia, 1987: 77）。所以，由新聞寫作演變而來的mass communication與由口頭表達演變成的speech communication之間，關聯很明顯。許多理論揭示兩者的密不可分，最好的例子是Rogers (1962) 的"Diffusion of Innovation"。研究發現若要瞭解社會改革過程，必須瞭解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互動關係。當Brock、Scott和Chesebro (1990) 介紹rhetorical criticism學者引進後現代主義批評方法的遠因時曾強調：二次大戰後愈來愈多人從面對面的rhetoric分析轉換至有大眾傳媒介入的rhetoric分析 (p. 431)。Delia (1987) 亦指出，許多rhetoric批評者變得很像質化分析社會科學家，在他們當中，分析影片、廣播傳媒變得很普遍 (p. 81)。現在，在很多美國大學裡，學生可在同一系上修到speech communication 和 mass communication 的課。許多學者認為，在communication課程前面冠上"speech"或"mass"實屬多餘，因為兩者已無法清楚劃出界限。

在communication相關學科大力整合之後，"speech"已漸漸不能代表在這個領域內許多人的研究或教學興趣。例如從事nonverbal communication、媒體效果、或傳播科技研究的人，並不以speech為主要研究課題。由是，很多人質疑為何要在communication前面冠上一個已過時，且具限制性的"speech"字眼。

拔除"speech"字眼的浪潮從1970年代開始延續至今。與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有密切關係的美國東、西、南、中四個地區學會，不但把"speech"字樣從會名上除掉，也把它從主要期刊上刪掉。這些期刊的新舊名稱及更改日期如下：

- 東部學會 (Easter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於1976年將Today's Speech 改為Communication Quarterly;
- 西部學會 (Western States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於1992年將Western

Journal of Speech Communication改為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南部學會（Southern States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於1989將The Southern Speech Communication Journal改為The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中部學會（Central States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於1988將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改為Communication Studies（Matlon & Ortiz, 1997）。

此外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亦於1976年將Speech Monographs易名為Communication Monographs，以及將The Speech Teacher易名為Communication Education（Matlon & Ortiz, 1997）。以報導rhetoric研究為主的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則未更名。同時，也有為數眾多的speech或speech communication系改名為communication或communication studies系。

在這種情勢下，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自然面臨了很大的改名壓力。尤其，它又是全球最大傳播學會，會員超過七千（全球第二大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擁有約三千會員），出版十種定期刊物（包括六種季刊），會內60個研究興趣組群（"NCA Unit Affiliation Report," 1998）幾乎囊括所有與傳播有關的課題。所以，終於在1997年初，經由會員投票表決易名為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更改學會名稱議案需投票會員三分之二支持始能通過。而在此次3,437位投票會員中，2,372位，即69%支持，因此易名生效（"Membership Changes Name," 1997）。投票之前，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會長James W. Chesebro曾撰文解釋為何要改名為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他說因為"speech已無法充分描述多數會員目前所做的工作，加上"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之名在學術界及外界造成許多混亂印象，而在不與現存其它學會名稱衝突且又能代表本會性質的考慮下，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實為最佳選擇（Chesebro, 1996）。

伍、結語

傳播行為為人類與生俱來，因此其歷史實與人類存在同樣悠久。傳播學則含蓋甚廣，欲理出源頭，絕非易事。作者在本文中，僅就與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NCA）發展有關歷史作摘要報告。掛一漏萬，在所難免。然從歷史的眼光看來，我們似乎可對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易名為National Communi-

cation Association作出以下結論：

天下事固然分久必合，合久比分，然鮮有無緣由分合者。在NCA歷史上，先是演講教師欲與「演講術」派及英文教師劃分界限，自組演講教師學會，稍後，演講學與其他口頭表達學科結合，形成包容性極大的speech領域。等到有些學科宣告獨立後，speech又因吸收了社會科學的研究而逐漸邁向廣義的communication，這樣卻與本來看似無關的廣電新聞領域找到了交集，而造成另一次的學術合流。這次的合流形成了今日美國傳播學的新貌。但這種合流絕不意味著speech communication的消失或沒落。而是將speech放在communication的大框架下探討。使speech communication研究更寬廣而符合實際。這種採用較具包容性字眼重新定位一個領域，是學術發展過程中合理正常的現象。

傳播研究一直是超越科系的。早期的傳播觀念更是不同領域學者的結晶。但今日傳播理論的周延深入卻必須歸功於傳播系對傳播研究的整合與推動。正如Delia (1987) 所言，早期分散在不同社會科學領域的傳播研究被speech系及新聞系「認領」了。爾後，這兩個「領養家庭」又因傳播研究的加入而自我再造 (p. 85)。當這兩個再造後的「領養家庭」發現彼此很類似時，自然設法拉近距離。Speech communication摘下了"speech"的帽子，就如同mass communication摘下"mass"的帽子，是意味著對communication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也是對speech與新聞再造後新血源關係的肯定。

台灣傳播界許多人對新聞廣電的歷史耳熟能詳，但對另一個communication的「領養家庭」speech卻所知不多。這也可解釋為何communication被譯為「傳播」。學過英文的人皆知"communication"在英文中有濃厚雙向交流的意思，但只懂中文的人卻很難從「傳播」二字嗅出雙向交流的味道。這是因為早期的新聞學就像早期的演講學，是以發送訊息為研究主軸，而台灣因受到新聞廣電知識的影響將之譯為傳播，就像在美國有些人受到speech課程的影響把"communication"與「說話」劃成等號。實則communication與兩個「領養家庭」皆密不可分。除NCA外的全球第二大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 的前身，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NSSC)，亦是任教speech系的學者於1940年代末期組成的 (Delia, 1987: 80)。

目前台灣許多傳播系所的學生均有機會接觸到來自兩個communication「領養家庭」的課程，這實在是件可喜的現象。學術無國界，而傳播學的知識也不應有「成份」問題。在我們瞭解了傳播學的悠久歷史及其發展過程後，更應珍惜這個領域的豐

富資源。

參考文獻

- Barnlund, D. C. (1962). Toward a meaning-centered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197-211.
- Benson, T. W. (Ed.) (1985).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Berlo, D. K. (1960).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Bochner, A. P., & Eisenberg, E. M. (1985). Legitimizing speech communication: An examination of coherence and cohes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In T. W. Benson (Ed.),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pp. 299-321.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Brock, B. L., Scott, R. L., & Chesebro, J. W. (Ed.) (1990). Methods of Rhetorical Criticism: A Twentieth-Century Perspective (3rd ed.). Detroit, MI: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Burke, K. (1945). A Grammar of Motiv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Burke, K. (1969). A Rhetoric of Motiv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sebro, J. W. (1996, November). Why we need to change our name to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pectra [The official monthly newsletter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32 (11) 2: 22.
- Delia, J. G. (1987).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history. In C. R. Berger & S. H.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pp. 20-98. Newbury Park, CA: Sage.
- Golden, J. L., Berquist, G. F., & Coleman, W. E. (1992). The Rhetoric of Western Thoughts (5th ed.). Dubuque, IA: Kendall/Hunt.
- Halstead, W. P., & Behringer, C. (1954). National theatre organizations and theatre education. In K. R. Wallace (Ed.), History of Speech Education in America:

- Background Studies [prepar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peech Association of America], 641-673.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Hovland, C. I., Janis, I. L., & Kelley, H. H. (1953).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owell, W. S. (1951). Ramus and English rhetoric: 1574-1681.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37: 299-310.
- Infante, D. A., Rancer, A. S., & Womack, D. F. (1997). Build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3rd ed.).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 Leff, M. C., & Procaro, M. O. (1985). Rhetorical theory in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T. W. Benson (Ed.),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pp. 3-27.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Matlon, R. J., & Ortiz, S. P. (Eds) (1997). Index to Journals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rough 1995. Annandale, VA: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 Membership changes name to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97). Spectra [The official monthly newsletter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33 (5): 1.
- NCA unit affiliation report. (1998, March 10).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natcom.org/aboutNCA/Units/Unitrep.htm>
- Rarig, F. M., & Greaves, H. S. (1954). National speech organizations and speech education. In K. R. Wallace (Ed.), History of Speech Education in America: Background Studies [prepar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peech Association of America], 490-517.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Rogers, E. M. (1962).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mplications of the Name Change from SCA to NCA

Ringo Ma *

ABSTRACT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study of rhetoric in ancient Greece. In the United States, separate departments of speech began to merge after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c Teachers of Public Speaking was formed in 1914. To reflect a broader perspective in speech art and science, the Association changed its name to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Speech in 1923 and the Speech Association of America (SAA) in 1946. In 1970, as a compromise between traditional interest in rhetoric and a broader concern with communication, the SAA became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 was adopted in 1997 largely because the term speech no longer reflects the work performed by many members.

* Ringo Ma (Ph.D., 1987, University of Florida) is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Fredonia, U.S.A.